

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

江 应 梁

一

中国素称“文献之邦”，昔人把汗牛充栋的各种著述，分别为经、史、子、集四库，史库中固然是史料汇萃之所，而经、子、集三库中，也有不少史料在内，所谓“六经皆史也”。民族史既然是历史的一个部门，那末，研究民族史，必然的一条途径就是从四库文献中剔检有关民族的资料。但文献资料，自古以来就有人怀疑其真实性，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这话虽言之过分，但历代文字记录的史料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国在距今三千年前就有史官的设置，对史官的要求是严格的，地位也是尊崇的，“秉笔直书”是史官首要的史德，私家修史也有同样的要求。但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用文字记录的史事，往往时真伪相杂，甚至是非无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唐代刘知几在所著《史通》一书中已作了一些中肯的答复。首先，儒家重“名教”，所谓“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为了名教，可以隐瞒真实，编造伪史。二是为了迎合主子的需要，保自身身家禄位，也不惜歪曲史实，流毒后世，“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直书》）三是主观臆度，为私人恩怨好恶而有意作伪，“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

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曲笔》）四是片面浮夸，“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疑古》）象这类的历史文献，确实“代有其书”，“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史官建置》）

民族史的史料中，不仅同样存在如上一些情况，而且更存在着另外一些问题：

（一）由于数千年来重华夏轻夷狄的大民族主义偏见普遍存在封建文人思想中，所以记载少数民族的史料，从数量上看就显得特别贫乏。有人举过这样的例子，中原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有三件史事很重要：一件是战国时秦国司马错定蜀，而《史记》记这件事仅用了十一个字；二是楚庄蹻王滇，《史记》算是记载得有头有尾的，但也只用了八十六个字；三是诸葛亮平南中，《三国志》叙述这件事只用了六十四个字。二十四史中虽然每部内都有有关少数民族的专传，但从数量看是极不相称的。

（二）历代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大都通过战争与经济掠夺，因此，所记史料也大多是征伐、招讨、宣谕、封官等类的事，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民族形成、民族发展、民族关系、民族迁徙，以及经济生产、人民生活、文化艺术等，大多缺乏记载。

（三）既有歧视少数民族成见，又缺乏调查研究，往往以讹传讹，猎奇搜异，不惜编造虚事以侮辱之，以骇世俗之人，《论衡·书虚篇》称：“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史志中所记民族习俗，象这样情况的并不少见。

由于文献史料中存在着如上一些问题，仅依赖文献史料来研究民族史，除开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一基本知识外，还要学会考证、训诂、注释的本领；还得大量搜集史料，沙里淘金，集同类的若干事对比研究。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少。个人一生精力有

限，今天国际上各门科学的发展创新，一日千里，我们如果依然跟着古人走，在故纸堆中搜寻，这样研究民族史，确实已走进了死胡同中，没有出路了。

二

二十世纪初年以来，我国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已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就是把民族史、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把民族调查作为民族史研究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大量利用调查资料来补充映证文献史料。把考古学的发现用作民族史的有力论证。这是民族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突破，现代我国民族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能不归功于这一突破。

不过，这种结合我们认为还不够完善，还只是部分的结合。我们认为民族史不仅要和民族学、考古学结合，还得进一步和体质人类学、民族语言全面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入广阔的天地。

人类学是一门现代科学，人类学这一名称，虽然早在十六世纪已出现在学术界中，但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却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只是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发展、演变的一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十九世纪中叶，人类学才把体质、社会、心理三方面作综合的研究，也就是说人类学同时是研究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发展、演变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应当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无论属于哪个范畴，既然研究的是有关起源、发展、演变，那就离不开历史学。人类学的含义，目前学术界的看法虽然还有分歧，但我国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包含四个学科，即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我们认为这四门学科结合到民族史研究中来，必然会发生重大的作用。

把民族学结合到历史研究中，实际上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而

是古已有之的。民族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固然只有不到二百年历史，但有关各民族情况的历史记录，也就是民族学的记录资料，不论在中国或西方，都是很早就有了。上文说到我国历代封建文人，有着传统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思想，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历代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甚至民间诗人，他们由于居住或工作地点于少数民族地区，有意识地搜集了一些少数民族资料，写为篇章，成为我们今天从事民族史研究者的珍贵文献，《诗经》、《楚辞》、《山海经》，其中有不少民族学的资料，这是大家知道的。此外，常被人们引用甚至辗转抄录，我们今天也认为史料价值较高的著述，几乎可以说都是亲身见闻或实地观察的记录，事实上也可以说这是用民族学的方法写出来的历史文献。象这类的作品，各个时代都有，以西南地区而论，可以作例子举出的，首先当推《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在二千二百年前就能对极复杂的西南民族，提纲挈领地理清他们的族属渊源，记述他们的居住地域，社会性质，生产与民俗特征，部落之间的关系等，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这样被称为瑰宝的著作呢？就是因为他曾经亲自到过这些民族分布的金沙江、大渡河一带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实际是司马迁对西南夷的一篇调查报告。

晋人常璩写的《华阳国志》，是最早的一部西南地方志，书中内容也大都是根据作者的见闻记录的，常璩长期生活在蜀中，曾在氏族建立的成汉政权李势时做过官，官至散骑常侍，他曾经劝李势降桓温，是一个关心地方事务的文人，从书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巴、蜀、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是通过调查而有所了解的。

唐人著作有樊绰的《蛮书》，绰于咸通元年到四年（公元860—863）在安南都护府任从事，正遇南诏三次攻安南，再度陷交趾，他认识到南诏与唐王朝关系的重要，有意识地在居住安南时对南诏情况进行调查，参考了前人著述，写成《蛮书》，记云南事

极详实。有刘恂的《岭表录异》，恂在昭宗时（公元889—904）官广州司马，任满后留居南海，写成是书，被后人认为是粤东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凡言及岭南风土民情的，多援引刘恂的书。又有段公路《北户录》，也是居广州时所写，还有莫休符，昭宗光化间（公元898—900）以检校散骑常侍出为融州刺史，撰《桂林风土记》。

宋时，有范成大于乾道八年（公元1172）知静江府，在桂林住了三年，写《桂海虞衡志》，中有《志蛮》篇，序中说：“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著之”。周在非于淳熙时（公元1174—1189）官桂林尉，所著《岭外代答》十卷，序云：“广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风，内包黎僚，远接黄支，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耳目所治，得四百余条。”朱辅曾服官辰州，据所见闻撰《溪蛮丛笑》一卷，记五溪蛮风土物产颇备。

元代的周达观，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随元朝招谕使臣到真腊国（今柬埔寨），住居三年，对真腊风土民情极为熟悉，写成《真腊风土记》。又李京的《云南志略》，据序言中说：“大德五年（公元1301）奉命宣慰乌蛮，为措办军储事，遍历乌蛮、六诏、金齿、百夷，二年之间，奔走几遍，于是山川、地理、土产、风俗，颇得其详，自以所见，参考众说，为《云南志略》四卷。”

明人著作有《百夷传》，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钱古训、李思聪使缅国及麓川，归著《百夷传》，记其山川、人物、风俗、道路之详。明、清地方志凡言及德宏傣族，大都转录自这本书。又张洪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奉使到缅国和麓川，写了一本《南夷书》。田汝成著的《炎徼纪闻》，是他历官广东签事、贵州签事、广西布政司右参议，分守右江，遍历西南夷区，记述所闻，著为此书。又有南海人邝露，游广西时遍历岑、蓝、胡、侯、槃五姓土司，瑶女云婵娘留掌书记，归而述所见闻，著《赤雅》。还有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徐游踪遍及西南荒僻之区、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所到之处，排日记载，所记皆“足履

所至，耳目所亲”。书中不少有关少数民族的实录记载，堪称珍贵的民族学资料。

清代著作，略举两书为例：段汝霖的《楚南苗志》，是作者官湖南永绥同知时得诸见闻而作，时人称为“事皆质实”。陆次云的《峒谿纖记》，所记各民族的种落习俗，是用亲身见闻来订正诸书所记的同异。

所以不嫌繁琐的举了这多例子，目的就在于说明一个事实：民族学在民族史研究中能够产生极为巨大的作用。千百年来，凡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来的书，今天都不失为珍贵的民族史资料。古人不懂民族学，但能根据见闻，如实记录，反映出一种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特色，实际这也就是民族学。

三

考古学在民族史研究工作中起到的作用，那是人所共知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来，我国考古发掘工作取得辉煌的成果，民族史研究借助考古学解决了不少问题，这里就不必多说了。民族语言对民族史的作用，也是显然的，区分民族族别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民族语言。《后汉书》记载的一篇《白狼文》，根据彝族语言对照研究，知道汉时的白狼部落，和今天的彝族有族属渊源。刘向《说苑》记载的一首越人歌，和今天壮族语对照，在三十多个古越语中，有约十个字的音义都和壮语相同。根据一首民歌，解决了民族族源上的两个问题：一是今壮族和古越人有族属渊源；二是楚与越不是同族。——有人根据《汉书·地理志》越地注中的一句话：“《世本》云：越为芈姓，与楚同祖。”认为楚与越是同族，《说苑》记楚国的一位公子在舟中听操舟的越女唱了一首越歌，这位楚公子说：“吾不知越语，子试为我楚说之。”

人类学包含的四门学科，已经有三门结合到民族史研究中来了，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体质人类学在民族史中起的作用？体质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特征的起源、发展和变易的一门学科，根据对人体的骨骼、皮肤、毛发、肤纹、血型等的实测数据和观察论断，用形态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体质的共性和多人群间的变异特点与亲疏关系。民族史也正要追寻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变异，研究各民族的族源和融合关系，二者不正是有着共同的目标吗？民族史依靠文献记载和调查资料不能解决或不能确知的一些问题，体质人类学可以提供我们有力的论据，使我们能够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十九世纪末期，西方殖民主义“学者”有所谓“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言论，认为中国人种（蒙古人种）是从高加索迁来的。我国学者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早已驳斥了这种谬论，近来有人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上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论据。根据人体测量得出的结论：“人种不同肤纹差别大，民族不同而人种相同，肤纹差别小。”他们实测了千例以上的蒙古人种和六百多例的高加索人种的肤纹，结果表明差异很大。白色人种的斗型指纹频率仅为黄色人种的二分之一强；小鱼际花纹在白色人种中很高，高于黄色人种的三点五倍；白色人种的第三指间区纹频率是黄色人种的三倍。有人实测了壮族男性243人和汉族男性520人，两族人群的肤纹数值极为接近，差别之处很小，而许多项目是一致的^①。这不仅证实了中国人种并不是高加索人种，也纠正了另一种错误的说法，所谓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与汉人不同种说。

我国西南几个省、区，是少数民族族属和人数分布最多的地区，对于各族的族属渊源，在漫长的历史中互相融合的情况，虽然在民族史研究中已经明确了一些问题甚至可以得出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单纯根据文献资料是不可能搞清楚的。最近几位人类学工作者，到云南、广西测量了彝、白、傣、瑶、哈尼、基诺等六个民族的体质，从肤、发、眼、头型、面部特征、身高、体重、指距等方面，得出如下的结论^②：

1. 彝族肤色虽浅，但身材并不十分高大，发色黑，百分之

九十九以上为直发型，眼色深褐，百分之五十以上蒙古褶微显或中等，面部中等扁平，眼外角明显高于内角。因此认为彝族并非以往有人所认为的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而是属于蒙古人种，在体质上较为接近东亚类型。

2. 白族肤色浅，眼色深褐，发黑而平直，中头或圆头型，蒙古褶微显，中面型，眼外角高于内角，面部扁平度中等。白族属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

3. 哈尼族肤色浅黄，眼色深褐，发黑而平直，蒙古褶比例很高，面部扁平度为中等。种族特征属于黄色人种的东亚类型。从族源来说，较接近彝族、白族、瑶族，但身材较矮，又有某种南亚类型的成份。

4. 瑶族肤色浅棕，眼色暗褐，发黑而平直，圆头型，阔面，眼外角高于内角，蒙古褶中等显著，凸唇，唇厚中等，身材较矮，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在某些方面具有南亚成份。

5. 基诺族肤色浅黄，眼色深褐，发色深黑，直而硬，蒙古褶出现率较高，面部扁平度中等，头型中等，阔面型，中鼻型，唇厚中等，身高中等偏矮，属蒙古人种而与东亚人种类型的特征相似。

6. 傣族肤色较深，呈黄棕色，眼深褐色，发黑而平直，蒙古褶微显，眼外角明显高于内角，中头型，男中面型，女阔面型，鼻梁平直，凸唇，身高较矮，鼻孔最大径有一定比例的横位。从体质特征上看属于蒙古人种，较接近南亚类型。

历来从事民族史的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彝与白同一族源，哈尼、基诺与彝、白有亲属关系，傣族来自古越族，瑶族是五溪蛮后裔。但在体质研究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彝族和白族都属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基诺族有东亚类型的特征，傣族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而哈尼和瑶族却又都具有某些南亚类型成份，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哈尼族的头型指数与彝族、白族近似，但又与台湾省高山族的太么人、萨摩雅人比较接近，

而鼻型较宽，接近傣族。这是给我们提出的第二个课题；彝族在九百多例中有1%的波发和卷发型，哈尼族在五百例中有极少数波发型，基诺族在九百八十多例中有百分之三的波状发，瑶族在五百二十多例中有个别波发型，但在一千多例的白族和一千多例的傣族中，都全是直发型，没有发现波发或卷发。这是第三个可以研究的课题。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体质人类学在民族史研究中既可以提供论证，又能够提出问题。而且不仅活人的体质研究对民族史有作用，就是对死人的体质研究，也可以给民族史上解决一些问题。古尸是珍贵的人体标本。近年各地都有出土的古代干尸，人类学家对干尸进行研究，对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史各方面，都能提供重要的材料。例如新疆吐鲁番盆地出土的五具干尸，四具是南北朝时期两对夫妇的尸体，一具是唐代女尸。经观察研究，知道千多年前住到新疆的汉族，在风俗习惯上受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很深^③。又在新疆发现三千多年前的女尸，经观察和测量，知道并非汉族，但因缺乏对比资料，尚不能确定与现代新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再与其他三具古尸对比研究，从其头型指数和头发血型研究，知道她们是同一种属共同生活在一个氏族内的人群^④。

从以上各个实例中可以看出，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在民族史研究中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

注释：

- ① 据上海第二医学院生物教研室张海国、王伟成、许玲娣、杨珏琴、赵煜萍、董建中等著：《中国人群分布特征及其在人类学上的应用》，1981年5月中国人类学会首届年会论文。
- ② 据上海复旦大学吴融西、夏元敏、王桂伦、戴星翼，上海自然博物馆陈翁良、郭常富、魏伟、翁丽玉等提交中国人类学会首届年会的论文：《彝、白、傣、哈尼、瑶、基诺等六个民族体质的初步研究》。
- ③ 据北京自然博物馆邵福根提交中国人类学会首届年会论文：《新疆吐鲁番盆地干尸的研究》。
- ④ 据上海自然博物馆徐永庆、何惠琴提交中国人类学会首届年会论文：《一具三千多年前哈密女尸的人类学观察和测量》。